

大藏经札记二则

李际宁

一、“崇宁万岁寺”、“崇宁万寿寺”辨

宋人梁克家的著作《三山志》是一部记载福州地区地理、人文的重要文献。笔者注意这部书，是因为它记载了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的历史及该寺雕印《崇宁藏》的一些情况。其实，凡研究《崇宁藏》者，可以说，必然要用到这部资料。然而，《三山志》在记载东禅寺于崇宁年间改寺名一事，却与其他资料有悖，孰是孰非，有必要做点辨证工作。

《三山志》卷三十三记载：

东禅院，易俗里。五年，州人郑昭勇捐宅为之，在白马山上，旧名净土。唐武宗废为白马庙。咸通十年，郡人迎僧惠筏居之，及夜禅定，有戎服若拜而辞者，是夕或见白驹东之。观察使李景温因撤祠为寺，号东禅净土。钱氏号东禅应圣。皇朝大中祥符八年，赐号东禅等觉。崇宁二年，因进藏经，加号崇宁万岁。绍兴十年，改崇宁万岁为报恩广孝。十七年，改广为光。……有大藏经版，侍郎陈赐劝造。

按照梁克家的记载，崇宁二年，东禅寺因大藏经刊成，上奏朝廷，得赐大藏经名《崇宁万岁大藏》，寺院亦得敕赐，加封寺名曰“崇宁万岁寺”。

以“崇宁万岁”为寺院名称者极为少见。通常，文献资料凡涉及此一寺名的时候，几乎全无例外地记录为“崇宁万寿寺”。这样的记载，史料中不胜枚举。宋徽宗继位，定年号建中靖国。第二年（壬午 1102）便改元崇宁，随后诏赐全国建立以“崇宁”为名的寺庙。《释氏稽古略》徽宗壬午年下记：“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壬午年条记载：“改年崇宁（铸崇宁当三钱。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又改天宁，替先号）。”不仅佛教寺院如此改名，当时道观也敕令统一改名。比如，《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四记载：“崇宁二年改崇宁万寿观。”这是当时的一项法令，颁赐的寺院道观名称是不能随意改动的。

高宗绍兴九年，定都临安。《释氏稽古略》记载，为给徽钦二宗祈福，下诏诸郡县州，改崇宁万寿寺（或天宁寺）为报恩光孝禅寺，以奉徽宗皇帝香火也。当时，改天下崇宁万寿寺（或天宁寺）为报恩光孝禅寺以为被金人北掳的徽宗、钦宗两代皇帝祈福是南渡初的一件大事，福州东禅寺亦不例外。包括《三山志》在内的许多史料记载，绍兴十年，诏改福州东禅寺名为报恩广孝禅寺，十七年再改报恩光孝禅寺。

其实，福建东禅寺在崇宁年间到底改为何名，还有一件重要资料可以为证，就是北宋颁赐《崇宁藏》的敕文。这篇敕文刊在《崇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之首：

敕赐福州东禅等觉禅寺天宁万寿大藏

暘窃见 朝廷近降指挥

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

候了日赐经一藏有以见

圣朝绍隆佛乘祝诞

睿算实

宗庙无疆之福然暘契勘大藏经唯

都下有板尝患遐方圣教鲜得流通于是亲

为都大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慧荣冲真

智华智贤普明等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

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宁二年冬方始成就暘欲乞

敕赐东禅经藏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祝延

圣寿取 钧旨

十一月日奉议郎守尚书礼部员外郎充讲义司参详官陈暘札子

十一月二十日进呈三省同奉

圣旨依所乞已降

敕命讫二十二日午时付礼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

尚书省牒福州崇宁万寿大藏

礼部员外郎陈暘白札子窃见

朝廷近降指挥

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候了

日赐经一藏契勘大藏经唯

都下有板于是亲为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

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及建立藏院一所欲乞

敕赐东禅经藏以崇宁万寿大藏为名候指挥

牒奉

敕宜赐崇宁万寿大藏为名 牒至准

敕故牒

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牒。

司空兼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上柱国南阳郡嘉国公蔡京；

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蔡卞；

特进行门下侍郎上柱国长乐郡开国公许将；

右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侯赵挺之；

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丞上柱国武昌郡开国侯吴居厚；

右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清车都尉寿阳县开国伯安惇；

朝散大夫试礼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修撰徐铉。

这件敕文，记录了礼部侍郎、东禅寺大藏经都劝首陈暘上奏朝廷的奏章，以及朝廷批准的敕文。陈暘，《宋史·儒林传》（卷四百三十二）载：“陈暘，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陈暘因大藏经版刊成，故请赐大藏经名《崇宁万寿大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因大藏名而改名“崇宁万寿寺”。

当年刊入《崇宁藏》的敕文，随大藏一起雕版印刷流通，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虽然没有被传统文献记载，却幸赖《崇宁藏》中得以保存。这件敕文在日本还有多件，仅据笔者所见，就有宫内厅书陵部、横滨金泽文库、京都东寺三个单位收藏。

由此看来，崇宁年间福州东禅寺敕改后的名称，应该叫“崇宁万寿寺”，上述梁克家在《三山志》中的记载有误。

梁克家有关《崇宁藏》的误记其实不止这一处。本文前引关于东禅寺和《崇宁藏》的文字中，最后说寺内“有大藏经版，侍郎陈暘劝造”一句，就给研究者带来许多麻烦。《三山志》说是“陈暘”劝造，可是有关《崇宁藏》的卷首刊记却记载以“陈暘”为劝首。到底是“侍郎陈暘”还是“侍郎陈赐”，一字之误，谬之千里。从上述史传和崇宁藏的敕文证明，崇宁藏的劝首应该是“侍郎陈暘”，而不是“侍郎陈赐”。

看来，不论多么重要的史料，使用时都要做些辨证，考察一下，用起来才放心。

二、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磻砂藏》

全世界已知比较完整的《磻砂藏》只有五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北京柏林寺藏品、陕西省图书馆藏原西安市开元寺和卧龙寺藏品、山西省崇善寺藏品、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哥斯德

东方书库藏原北京大悲寺藏品、日本杏雨书屋藏原对马宗氏藏品。其余零种零册，不计其数。

《磧砂藏》开雕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全部正式完工，已在元大德十年（1306）以后。明代初年《磧砂藏》曾经大规模补板，并大量印刷流传。根据当代学术史资料显示，目前存世的《磧砂藏》，绝大部分都是明初补刊本，其显著特点，就是卷首扉画及其左右两下角分别刊雕的题记“杭州众安桥杨家印行”及刻工“杨德春”，还有卷尾的牌记：“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

“众安桥”作为地名，在《乾道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上已有记载，桥跨清湖河上。《中国版刻图录》谓众安桥为宋代杭州文化发达地区。

历来古籍版本研究中，专论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的极少，据笔者所知，只有少数研究者提到，如张秀民等先生。事实上，众安桥杨家经坊的记载，大约在元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元明两朝间刻印装帧书籍、特别是佛教典籍中，众安桥杨家经坊有过重要作用，其中特别是与《磧砂藏》的关系更为密切。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明代刻书一章，列有杭州可考书坊二十四家，其中有“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一条。张先生概述杨家经坊刻书时说：“杨家经坊刻《天竺灵签》（约洪武十八年）、《金刚经》，至成化十一年仍刻佛经。”张先生所说的这三种书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另外，笔者在日本还曾见到一件。几年前，在整理馆藏柏林寺本《磧砂藏》的时候，又发现一本残册。这样，有关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不多的几条资料，在排列比较之后，或许可以有助于分析杨家经坊发展变迁的轨迹。

杨家经坊的作品，就已经公布的资料看，最早者似乎当属收藏在日本京都南禅寺的一件《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件不论从纸质、还是字体判断，都是元代刻经的风格，卷首扉画的左下边刊“见杭州众安桥北经坊杨六郎印行”一句。这是杨家经坊在元代已经有活动的记录。

在元代中期以后至明代前期，承担印刷并装帧《磧砂藏》，使杨家经坊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其时杨家经坊掌握着一批著名的画工刻工，如画工陈升，刻工陈宁、袁玉、孙祐。这些工匠的作品——磧砂藏扉画，成为元代版画艺术风格的代表。而工匠陈宁的刻书活动，1988年《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刊登了宗教研究所张新鹰的文章《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他利用陈宁曾经刊雕过的《至大博古图》和《元官藏》的资料，推测他的生活时代当在元武宗（1308—1311）至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前后。陈宁的背景，使笔者颇怀疑杨家经坊亦有相当官方色彩。

至晚到元代末年，在《磧砂藏》中有了署名“杭州众安桥杨家印行”扉画，这幅扉画的刻工是“杨德春”。他所做扉画，较之其他几幅作品，粗糙了许多。入明以后，《磧砂藏》大

规模补版，这个时期杨家经坊又出现了一位新的刻工，他的名字，笔者仅在国图收藏的柏林寺本《磧砂藏》中见到过，叫“杨信真”，他雕刻的扉画完全仿照“杨德春”的作品，但却刀法生硬，人物形象缺乏生动感，刻板线条涩滞。这个时期，补雕的《磧砂藏》的字体，也不象原版那样字型略成竖长、清秀有力，而较扁平、柔软。

《磧砂藏》在明代前期以后就少有请印了。

在《磧砂藏》以外，杨家经坊还刻过一批单行本佛经：

1、《天竺灵签》一卷，经折装，上图下文，框高 17.8 厘米，半叶宽 7.8 厘米。郑振铎先生原藏。卷后有牌记，题“洪武乙口岁在仲冬吉日刊/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原题记“乙”后一字残去，张秀民先生推测应为“乙丑”，即洪武十八年（1385），张先生注其版本为：“约洪武十八年”。

2、《金刚经》一卷，经折装，上图下文，框高 23.3 厘米，半叶宽 11 厘米。郑振铎先生原藏书。卷后莲花牌记内刊：“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着录为“明初杨家经坊刻递修本”，当是可信的。

3、张秀民先生在述及杨家经坊刻书时说：“至成化十一年仍刻佛经”，此一句当指馆藏《梵网经菩萨戒、四分戒本、戒坛普说法仪》所言。这部书前有两幅扉画，书后有莲华牌记：“此板于紫云洞，原本经律仪文一无增损，但其间字画差讹、语义重复者，今悉改正。杭州在城大街观桥南杨家经坊印行，时大明成化十一年岁次乙未七月吉新刊。”

4、笔者几年前在整理本馆收藏的原柏林寺本《磧砂藏》时，在残叶中还发现一部属于杨家经坊的佛教丛书残本。这件薄薄的经折装小册子两面印刷，上下皆残，已经看不出正背面。经册纸质较粗糙，字为楷体，其整体风格颇类上述《金刚经》。书高 22 厘米，一折宽 8 厘米，上下单边。全书刊佛经计有《大佛顶首楞严神咒》、《佛说解百家生冤结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佛顶尊胜陀罗尼》、《金刚经》、《般若无尽藏真言》等。在《般若无尽藏真言》后，有莲花牌记，刊“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一行。从风格推断，其年代当在明代前期。

大概在明代中期以后，不再见到有关杨家经坊的记载，杨家经坊衰落了。笔者曾经在论文中对这种现象分析过，认为：“一个商业机构的存在与发展，应当离不开现时的社会需求与环境。”明代初期以后，环境变化，导致雕刻佛教大藏经和印刷装帧等一系

列活动发生改变，这是杨家经坊发展、衰落等变化的原因。分析杨家经坊与《磧砂藏》的关系，意义重大。